

战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 工人运动论丛



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编

前 言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蓬勃发展，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全面铺开。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各个部门和各种专业都面临着如何通过改革开创新局面的重大课题。同时，世界上正在掀起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它给我们提出，许多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新课题。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这种客观需要，并发挥首都 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我们学会于今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八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了全国性的“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研讨会”，邀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的研究员、教授、学者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报告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对国际共运和国际工运的总体宏观研究；关于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关于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有这些方面的报告都是报告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着重地论述了最近几年来国际共运和国际工运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我们认为，这些学术报告对于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工运史这两门学科的改革和发展是会起促进作用的。

现在，为了满足参加“研讨会”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的要求，我们学会将这些报告整理、汇编成此书，内部发行。还有个别报告未能收入书内，请读者谅解。限于我们的时间和水平，编辑工作定会存在一些缺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战后国际共运的曲折发展及其提出的若干重大问题···	(1)
关于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	(45)
战后国际共运的趋势和特点·····	(68)
战后国际工人运动几个问题的探讨·····	(107)
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	(125)
赫鲁晓夫的再评价·····	(162)
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	(193)
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	(216)
关于匈牙利经济改革问题·····	(242)
波兰和波兰工人运动·····	(262)
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289)
当代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潮·····	(309)
非洲社会主义思潮的情况介绍·····	(350)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概况·····	(374)
越南反华的国内外背景·····	(412)

战后国际共运的曲折发展

及其提出的若干重大问题

高 放

一、战后四十年来国际共运的曲折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来，国际共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战后国际共运四十年我们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5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前。这将近十一年的时间可以概括为是战后国际共运大胜利、大团结的阶段。

第二阶段，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到1976年秋。这个二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概括为是战后国际共运大动荡、大分化的阶段。

第三阶段，从1976年秋到现在，大约是九年的时间，这一段可以概括为是大调整、大改进的阶段。这是我个人一点粗浅的体会，初步的概括，把战后国际共运的四十年分成这样的三大段。这三大段的许多事情同志们都很熟悉。我这里只是扼要地概述一下。今天想着重地讲一讲这样的曲折发展给国际共运提出了哪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问题。

先讲第一大段。战争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1949年11月写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篇文章中，曾经这样指出：“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这段话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国际共运开辟的道路和十月革命相提并论，认为同样开辟了广阔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几年的事实确实可以看出来，反法西斯的战争胜利给国际共运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扩展到十三个国家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从1945年到1949年，在东亚和东欧有十一个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除了这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加上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总共有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在1924年建立的，但是它最后正式脱离中国，被世界上公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1945年8月，在蒙古进行了公民投票，绝大多数蒙古人民投票赞成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所以这样，战后就有了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理上东西南北连成一片，东边从朝鲜半岛开始，西到易北河边民主德国，北起苏联，南到印支半岛越南民主共和国，联成一片。这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还通过一系列的双边条约，组成了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1月，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在经济上加强联系合作，成立了经互会。

1955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之外，还组成了一个军事集团，缔结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各国经过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了民主改革，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六年计划。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领土上占全世界的25%以上，在人口上，占全世界的35%以上，工业产值，五十年代中期大约占全世界工业产值的30%左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取得的胜利大约在领土、人口、工业产量方面，都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国际共运出现了一个大胜利、大团结的大好局面。

除了社会主义各国之外，在资本主义世界，战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争取和平和争取人民民主的运动，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联国际民主妇联等各种群众团体。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在合法和非法斗争当中，也取得很大的成就。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已经达到2000万人的话，那么，到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3000万人。从1945年到1955年，即战争胜利后的十年，世界上新建了十二个共产党。这大体上就是国际共运战后第一个阶段大胜利大团结的基本情况。但是，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56年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就是大动荡，大分化的阶段。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由于苏共领导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处理得当，所以，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开端，各国共产党之间就发生了很多争论，最初，是围绕着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如

何对待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发生分歧，接着还有关于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的问题，再有，在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方针政策上，在怎样改革斯大林后期的对内对外政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分歧。1956年秋，又发生了波匈事件，各国共产党围绕着波匈事件发生了争论。1957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试图缓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曾达成协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但是在通过莫斯科宣言的时候，南共对莫斯科宣言的一些原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比方说南共不同意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同意对苏联的经验作出那样高的评价，所以南共就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没有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随后1958年，南共“七大”通过了新的纲领，新纲领的许多提法是与《莫斯科宣言》不一致的。于是，由苏联共产党带头，1958年初期又一次掀起了对南共纲领草案的批判。继1948年情报局之后，第二次开展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世界规模的运动。这样，本来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和社会主义各国恢复关系的南斯拉夫又和社会主义各国中断了关系，第二次被扣上修正主义帽。1958年，1959年之后，中苏矛盾激化，1960年，我们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名义上是批判南共，实际上锋芒已经指向苏共领导集团。特别是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领导组织了一批兄弟党，对我们进行围攻，使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又尖锐化。1960年秋后，又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当时也是力图解决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经过斗争，达到妥协，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但是由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尖锐、深刻的，所以，在《莫斯科声明》之后，双方都各取所需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

《莫斯科声明》当中对自己有利的言论。论战又加剧了。特别是1961年，苏共召开了“二十二大”，在“二十二大”上，苏共通过了新纲领，新纲领中有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是我们党不能同意的。同时苏共的“二十二大”又公开地批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通过苏共“二十二大”，中苏的矛盾又激化了。1962年到1963年，欧洲五国党开党代会的时候，又继续批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影射、攻击我们中国。这样，在1962年底到1963年初，我们党就发表了八篇文章予以批驳。这八篇文章的发表也使我们和欧美很多共产党的分歧更加尖锐。1963、1964年，苏共中央挑起了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我们中央来信，提出要召开新的莫斯科会议，制订国际共运总路线。我们在1963年6月14日，提出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与苏共针锋相对，我们不同意召开新的国际会议。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告诉他们全体党员，发表了六篇告苏共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书，把中苏两党的分裂公开化。这样，从1963年9月到1964年秋天，我们先后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告全体党员信，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九评”。这样，中苏两党之间就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大论战之后，1965年，苏联新的领导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继续搞分裂国际共运的活动，曾准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对我们进行集体制裁。不过1966年3月苏共中央要召开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时，还请我们党派代表参加，当时刘少奇同志还想维持中苏两党的关系，准备派代表团参加。毛泽东主席不同意，最后就没有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会”，从此，中苏两党关

系最后决裂。从1966年到1976年，这是我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动乱的十年，同时也是国际共运大动荡、大分化的十年。在我们党的极左路线影响之下，一部分支持我们极左观点的人从各国老共产党当中分化出来，另外成立了一个“左派党”、“马列共产党”。同时，中苏两国进入对抗状态，苏联极力想颠覆我们的政权。除了利用王明在莫斯科成立所谓“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之外，还想武装颠覆我们。所以，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加剧。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达到了高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达到高峰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曾经准备先发制人，用核武器摧毁我国西北的核基地。当时西方透露这样的消息，我们当时就发表了严正的声明：如果苏联领导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七亿中国人民将进行坚决的还击。这样才使得苏联领导没有敢使用核武器。1968年，又发生的苏联侵捷的事件。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遭到苏联武装入侵。这事件也使许多原来跟随苏联的老共产党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表示不满，甚至提出抗议。大体上，从苏共“二十大”到1976年，国际共运经过这么大动荡，大分化以后，1976年以后，进入第三阶段。国际共运出现了新的转机。

1976年有什么重大事件促使国际共运出现新的转机呢？一件是1976年6月29日，在柏林召开了欧洲共产党代表会议，有29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了柏林会议。这次会议苏共领导本来还是想把它的路线强加给各国共产党，并且想在会上继续进行反华。但在这次会议上，苏共领导的这些做法却遭到很多国家共产党的抵制。特别是南共、罗共、意共、西（班牙）共、比共、英共的抵制。他们在会上三次否定了由

苏共授意，而由民主德国起草的文件草案。这些国家共产党特别在柏林会议上强调不存在国际中心，领导中心，各党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柏林会议标志着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失灵，原来紧跟苏联的一些老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它们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调整自己的政策。1976年标志着国际共运新的转机另一个重大事件，众所周知，就是1976年10月我国粉碎了“四人帮”。开始虽然路线还没有立即端正，但是粉碎“四人帮”，为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政治上的前提条件。所以，从1976年以来，标志着国际共运有一个新的转机。1977年中南两国就恢复了国家关系，随后又恢复了党的关系。1978年，铁托同志访问中国。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我们党的路线，从这之后，我们对外政策有很大的调整。从1980年起，我们党就和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这些老的共产党恢复了关系。还和希腊共产党的国内派建立了联系。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党进一步扩大了和老共产党的联系，恢复了关系。除了意共、西共之外，我们还和法共、比共、印共（马列）、荷共、葡共、瑞士劳动党（瑞士共产党），还有墨西哥的统一社会党（墨西哥共产党）等等老共产党先后恢复了关系，建立了联系，互派领导人进行访问。同时，六、七十年代，中苏论战后新建立的共产党，在我们党端正路线之后，也发生很大变化，新建立的共产党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都重新总结历史经验，调整他们的政策，把重点转到主要在国内外进行活动，在国内争取群众，同时还和我们继续保持友好的联系。其中大约也有三分之一这样的党处境困难，活动很少。其中有一些停止活动了，还有一些解散了，还有一些

是调整路线以后并到老共产党里头去了。

1976年以后，正在国际共运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大调整、大改进局势的时候，局部还出现了一股逆流，就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继续坚持极左的路线，从1976、1977年起，公开进行反华。它声称反苏联修正主义，也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也反中国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全世界就剩阿尔巴尼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还有那么二、三十个新建立的左派党追随阿劳的极左路线，但这已经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了。从国际共运全面来看，是有很大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1983年春天，中央通知承认东欧五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从1983年春天以来，我们和东欧五国的关系逐步改善。今年3月，李鹏副总理到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的时候，发表谈话，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几年也在逐步地改善。大体上说，战后国际共运曲折地发展，我个人初步地理解，把它分成这样的三段。从大胜利、大团结，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到大调整、大改进。这个调整和改进才有九年时间，今后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二、战后国际共运的曲折发展提出的若干重大问题

今天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国际共运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曲折和反复，国际共运史上确实是交织着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成功和挫折。从1847年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以来，大体上是经过了六个高潮，战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第七个高潮。1848年革命是第一个高潮，1871年巴黎公社是第二个高潮，1905年革命带头的欧亚革命的高涨是第三个高潮。由1917年，俄国革命带头，出现了国际共运的第四个高潮。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东方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

主革命可以说是国际共运的第五个高潮。第六个高潮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战后，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前进，领导人民夺取新的胜利。这样，战后出现了第七个高潮，建立了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苏联，就有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今天来看国际共运历史上前六个高潮之后的六个低潮，大多是敌人的强大和镇压造成的，也有因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叛变造成的。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本来出现过新高涨的征象，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转移革命的视线，煽动沙文主义，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叛变。那么，五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共运的第七个低潮是怎么造成的呢？过去我们做了简单的、错误的历史类比，认为国际共运中大论战、大分化、大改组是因为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是因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叛卖造成的。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时，我党曾设想是否由我党来高举马列主义，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就会迎来第八个新的国际共运高潮。可是，近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我们这个设想没有实现，在实践中碰了大钉子。这是什么原因呢？看来，过去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国际共运的第七个低潮并不是因为敌人的镇压造成的，也不是因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叛卖造成的而是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认识不一致造成的。这说明当代国际共运确实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本来要求我们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回答、解决它们。由于各国党不一致，互相都认为是敌我矛盾，都无限上纲，这样，就把共产党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引起了大论战。大论战造成了大分裂，使国际共运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低

潮局面。现在，国际共运有了新的转机之后，确实很需要我们重新总结国际共运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战后国际共运曲折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样，对提高认识，推进国际共运、迎接未来国际共运的新高潮是有很大意义的。

那么，战后国际共运的曲折发展提出了哪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呢？应该说，问题是很多的，其中很多问题是禁区，不好研究，材料也很少，更难发表意见。这么重大的问题，只有中央做出决议才能算数。我个人的研究非常不够，看的材料也非常少，好在这次是内部的研讨会，我想抛砖引玉，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跟大家共同研讨一些问题。

从战后国际共运曲折发展所提出的第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就是个人崇拜问题，这也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首先引起国际上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对斯大林的崇拜是在三十年代形成，四十年代加深，五十年代推广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个人崇拜危害极大，它破坏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窒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分裂。如苏南冲突就是因为有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才造成的，各国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都相信斯大林，都跟着围攻南共。1956年苏共“二十大”有一个巨大的功劳，就是揭发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使得近三十年来国际共运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促进各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把马列主义和各国实践相结合，独立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共“二十大”起过这样的历史作用。但是，为什么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个人崇拜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个人崇拜问题在国际共运中并没有得到彻底克服，甚至还有反复性呢？比

方说，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中国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们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在国际共运中个人崇拜仍然没有绝迹。个人崇拜在国际共运中影响如此深远，我想，是不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传统的流毒很深。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是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缺少资产阶级民主，封建专制，个人崇拜的传统是很深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在传统观念方面又没有认真地进行过反封建斗争和教育。回顾社会主义各国历史，革命胜利后，都进行过土地改革，东欧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在经济制度方面进行反封建斗争，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各国都没有进行过。所以，各国这种个人崇拜的传统流毒很深。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进展，很容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滋长个人崇拜。人民群众中，个人崇拜是有市场的，在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他们对领袖的那种崇拜应该说是很虔诚的，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都有这个体会，当时广大群众恐怕还是很虔诚的，不能说是虚假的，这是历史传统在起这个作用。除了这个原因以外，第二个原因，就是领导上言行不一致。苏联领导虽然反对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苏联的新领导并不是言行一致的真正铲除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在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有过大功劳，但他没有全面地分析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主要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品质和思想作风问题。在他看来，换一个具有好思想好作风的领袖，如象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取代斯大林，那么，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勃列日涅夫也是这样，接着赫

鲁晓夫之后，又搞新的个人崇拜。再者个人崇拜之所以没能绝迹，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理论上不彻底。在我们国家看得很清楚，这一点滋长了对毛泽东新的个人崇拜。理论上不彻底，首先表现在：我们从1956年起，就在翻译的名称问题上做文章，把个人崇拜改译为个人迷信。从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篇文章起，我们把这个译名给改了。原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八大”文件都是用“个人崇拜。”可是，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我们就改为“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斯大林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把“崇拜”改为“迷信”。实际，“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实质上是是一致的，如果有区别的话，也仅仅是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个人迷信”比“个人崇拜”在程度上更深一些。我们当时为什么在译文上做这样的修改呢？我们是根据中文“崇拜”这个词的意思包含有对别人的钦佩的意思，并不是单指对人象神一样的崇拜。在中国古文里，“崇拜”这个词意思就是“尊崇、拜授”。例如《齐书百官志》里讲过：南齐的时候，左仆射职掌临轩崇拜等事。这意思就是说，象左右仆这样的大官，皇帝任命他宰相，他应该对皇帝表示感谢，表示崇拜。而外文的“崇拜”和中文的“崇拜”意思是不一样的，外文“崇拜很明显是指对神祭礼，对神的礼拜。英文作“cult”，“Personality cult”就是“个人崇拜”。俄文也是“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就是个人崇拜。所以，外文中，崇拜是有特定的含意。是指把人当神一样地崇拜。我们首先在译名上做文章，把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加以区别，意思是说，个人迷信是要不得的，而个人崇拜则是正常的，对杰出

人物就应该崇拜。这样，译文上改动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3月19日成都会议上，对个人崇拜就做了新的解释，他区分开两种个人崇拜，他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部分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例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打死斯大林，有人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毛泽东这段话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现在看来，他区分两种个人崇拜，是不妥的。他区分两种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在理论上为个人崇拜开了后门。个人崇拜，这是社会科学，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中的专有名词，不能作为普通名词来解释。比如说，对李白的崇拜，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对普希金的崇拜，那是崇拜他们的才华等等。个人崇拜不是这个意思，是特定的概念，是马克思1877年11月10日在给布洛斯的信当中提出，他“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后来，恩格斯、列宁又多次提到。我认为个人崇拜是指过分颂扬个人，夸大个人的作用。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两种目的的分析，这一点是对的。显然他